

# 序 章

## 生态人类学的领域和展望

〔日〕秋道智弥 市川光雄 大塚柳太郎

### 一 什么是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是人类学的一个比较新的分野。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 Orlove 1980 )。对生态人类学热情的高涨与环境问题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开发名义下的环境破坏和不顾后果地乱占资源的进程中，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重新修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作为人类学主要研究对象的采集民、农耕民、畜牧民、渔民，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与环境共生的智慧和经验，这样的期待也日益突出。

然而，那些密切依赖自然生存的人们由于市场经济的渗入、政府定居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化的影响，其生活面貌实际上已无可奈何地发生了变化。例如本书所列举的采集狩猎民就是这样的。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 ( 布须曼人 )、中非 ( 扎伊尔 ) 的俾格米人、加拿大的琪卑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他们都一直生活在被认为是远离现代化的沙漠、热带雨林和冻土地带这样的环境下，过着密切依赖大自然的生活。然而，由于定居化 ( 桑人 )、金矿开发带来的森林破坏、商品经济和酒精饮料的输入 ( 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 )，在短短数十年间，他们的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化。我们在采集狩猎民中看到的种种变化，其实在很多农耕民、畜牧民和渔民的社会中表现得尤为

显著。

那些以高度依赖自然的人们为研究对象，并以探索和掌握他们的自然环境观及知识为宗旨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对于这样的变化是绝对不应该欢迎的。有人由此认为，生态人类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果真如此吗？认为在环境遭到破坏的时代，作为综合探究人类生活的生态人类学便将结束使命，那也未免过于单纯幼稚了。这与生态人类学把人类研究作为目标的立场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浅薄之见。

我们对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所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依然重视。生态人类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关于这个命题，已经被可称之为基础科学的自然科学史观所证实。然而，如果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研究各种人群的生存方式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必须深入到他们的社会之中，与他们共同生活，详细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理解、把握其社会生活的整体脉络。前面谈到的采集狩猎民，在数万年间，他们也并非毫无变化。他们在与农耕民的共生或抗争中，与欧洲人接触中所发生的文化变化中，在以商品生产为媒介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中，他们的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与同时代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实实在在所看到的。我们认为，欲了解人们生活方式的全貌，即便是对于受着现代化影响的社会，也只有掌握其真实的状况才是确实可行的方法。

当代社会的趋势是把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都定位于一个共知的词汇“生态学”（Ecology）上，环保运动的热情极为高涨。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现象。但是环保运动所指的环境，多半是指受破坏的热带雨林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如果把与森林和动物共同生存的人类生活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虽然使用的是和生态人类学相同的“环境”这一词汇，然而实际上指的却是没有人类的“自然生态”。应该强调的是只有把人类的生活和环境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叫做生态人类学，这并非有意突出“环境”、“生态”这两个词汇。

在此虽无意专门佐证，但可举日本的例子稍作说明。日本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与全球“环境问题深刻化”的步调相配合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对日本、非洲、新几内亚、大洋洲、东南亚等不同区域进行长期的野外调查，以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的人们为对象，详细地收集和积累资料并探求理论概括的科学研究。

又例如，动物生态学的研究需要进行全面周密的环境观察，需要为构成生态学系统的植物进行认定和编目扎实地工作。同样，为了动态地

理解规制人类行为和环境的社会组织结构，就必须反复地观察所研究的对象。而为了实证地把握人类的行为、食物和营养的摄取、疾病、人口动态和人口迁移等情况，则需要综合地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按照这样的途径和方法去进行研究，就会获得从一般的见解和类型分析中难以预想的意外而有趣的结果和问题。

日本的生态人类学和很多国家保持着学术交流，而且不是那种二流水平的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学会和研讨会之类的交流活动多不胜数。最近十年间，以日本的生态人类学者为中心的国际学术会议就有好几个（例如 Ruddle and Akimichi 1984, Suzuki and Ohtsuka 1987, Ellen and Fukui 1996）。在此类国际研究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所持有的独特观点。我们所提倡的并不是在欧美社会中可以强烈感受到的二分法的观点，而是整体的观点。在谋求对全球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这一点上，正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可以说是体现日本生态人类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日本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不用说肯定是在日本的土壤中培育起来的，并且是在学术历史中成长起来的。要论述其全貌将会碰到诸多的问题，足可以写成一本书，而且内容深奥。所以，这里只想就目前日本生态人类学的两个流派进行简单地整理。所谓的两个流派，即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仅仅是毕业于两所大学的生态人类学者就非常之多，他们分布于各大学和各研究机构，活跃在生态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关于这一点，从本书的执笔者阵容中便可以感觉到。

## 二 从进化研究到人类的自然——京都大学的研究

### （一）人类进化的探索

京都大学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源流与灵长类的研究情况相同，可以追溯到今西锦司时代。即战前对 Ponape（太平洋中西部 Caroline 群岛中的一个岛）岛屿的调查（今西 1944）和大战时期在蒙古进行的一系列对游牧社会的研究。这些可以说是在生态学方面最早取得的业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尚无适当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的时候，今西锦司的研究著作《游牧论》（1948）和梅棹忠夫的《草原蒙古》（1955）等开创性的成果，在京都就成了引导有志于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研究者的指导读物。尤其是梅棹忠夫的论文，有对具体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的方法，并

且能从资料中引导出结论，与当时的随笔风格的人类学论文迥然不同，给人以清新的印象。可以说战后不久出版的关于平野村的调查报告《村庄和人》（今西 1952），也是有代表性的以独特方式对农村进行调查的战后生态人类学研究成果之一。

从事这些调查研究的并不是所谓的人类学专家或民族学者，他们有的是生态学者，有的是地理学者，而有的是农学者。人类学的研究并非一切都只能由其专家来进行的。无论是谁，假如发现了问题，只要下工夫去探索也未尝不可。或者，如果有了新颖的想法，也未尝不可将其用于研究。有人将此称之为“学问越境”，但非专业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可开拓的、新兴的研究领域，未必只能由那些呆板的人类学专家所独占，人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难道不更好吗？

正因为如此，京都大学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在以往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中难以看到的观点和方法。如以较重视严格的方法论程序，即“训练有素”（discipline 的学者之眼光来看，那也许有些外行之嫌。然而无论什么事，只要大家都能感兴趣的话，那么它就具有新鲜的吸引力。我想在选择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人当中，有不少人认为生态人类学不像数学、化学、语言学等学科，即使预先不接受专门的基础训练也可以从事研究。尤其是在生态人类学领域，“研究只要符合研究的进程就行”，这句话对很多人一定具有很大的魅力。

1959 年，京都大学在人文科学研究所中设立了社会人类学部。三年之后，即 1962 年，又在理学部新设自然人类学讲座。这样便大体上奠定了京都大学人类学的基础。此后，京都大学人类学便分成了以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以理学研究科为中心的自然人类学。在不长的时间内，自然人类学讲座倾力于日本猿和黑猩猩等人科以外的灵长类的研究，占据了该领域世界研究的领先地位。可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自然人类学讲座再次转向了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研究。这种变化与现在的生态人类学有联系，自那时起，生态人类学这一名称取代了文化生态学和自然人类学的称谓。

伊谷纯一郎（现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最早领导进行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人类的进化。而有关资料必须从现存的那些还极其依赖自然并以采集狩猎为生的人们的生活里去获取。由于人们早期的行为和社会已无迹可寻，所以如要复原其状况就必须研究与人类近缘的灵长类。同时，从现存的采集狩猎民的生活获得启发。1968 年美国出版的 *Man the Hunter*（Lee and DeVore 1968），就是这样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会和读书

会上多次受到推崇。作为这方面研究，还有开始于 1967 年对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桑人（布须曼人）的调查和 1972 年以来一直继续的在扎伊尔的伊图利森林中对穆布迪人、俾格米人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详尽地记述了已经适应非洲半沙漠环境和热带雨林的采集狩猎民的生计活动、饮食生活、分配行为、社会结构等，并从进化史的角度进行了探索。

对于根据现存的采集狩猎民社会的研究以探讨人类进化的问题，也有批评说这样做会误导人们对现存的采集狩猎民的认识。然而，当我们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探讨现在的采集狩猎民的生活时，是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事象作为启发的资料，借以推论过去人类的生活，而非刻板地反映他们的生活现状。现存采集狩猎民生活的各个片段可以说是被从其文化的整体模式中分离出来了，但只要意识到这一点，说我们的研究歪曲了采集狩猎社会的实情就是无的放矢。

## （二）人类的自然志

然而不久之后，在当时的生态人类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新的动向。研究者们认为仅把现存的采集狩猎民的生活作为研究人类进化的手段是不够的，应该进行以他们自身为主体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出现这样的倾向，最早是因为在日本国内进行的调查，即对吐噶喇列岛、冲绳南海诸岛的渔捞和农耕活动以及植物利用等方面的调查很难与人类进化问题联系在一起。非洲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刀耕火种民生计维持功能和农耕系统的研究、对畜牧民的畜群管理和维持功能的研究、对湿地渔民渔捞战略等方面的研究，都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记载，分析其生业活动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交换经济以及饮食生活等，研究目的十分明确。

这些研究虽然在涉及作为调查对象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时产生了许多差异，但如果挖掘其共同点的话，便会发现这些研究都对人类与自然关系之生态学及其技术层面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考察了被称之为社会组织 and 精神文化等的上层结构与其下层结构的关系。即以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为基调的整体研究乃是其方法论之特色。最近以来，以生态和技术为媒介在人类和自然之间结成的关系，与市场经济等更为广大的社会系统之间逐渐产生了某些冲突，这一现象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放弃在传统的生态人类学方法论中所假设的“孤立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此外，始于南海诸岛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层面的研

究，在非洲所从事的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动物学，即关于动植物的传统知识的研究，也活跃地进行着。相关资料目前正以资料库的形式进行整理。

1980年初期，行为学的研究盛行起来。这与其说是受西方人类生态学兴盛的影响，倒不如说是日本过去从事灵长类行为研究的学者们转向了人类学。日本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主要是由灵长类研究者开创的，他们继承了对布须曼人、俾格米人、图尔卡纳游牧民等在身体接触、寒暄行为、歌舞表演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其中被称之为“互助作用学派”（Inter Action）的研究者，他们与其说是生态人类学者，倒不如称之为行为人类学者更为合适。

如上所述，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生态人类学经过了人类进化研究，继而到对生业、技术、经济的研究和民族科学的研究，再到行为的研究这样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发展历程，而且其间并没有固定的，特别是叫做“训练”（discipline）的一贯的方法论。如果硬要归纳其研究特征的话，那就是从自己观察的具体事实出发，严谨地追求人类社会（广义的）自然志的探索。所谓生态人类学，可以说就是“新生的”人类学，比之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事实和资料也许更受重视。这样的研究，以传统学院派的眼光来看，那是不成熟的。但是，如果不是按照“训练有素的学者”之要求去做生硬的研究，而是去感受不同对象的兴趣点的话，那么就能更好地把学识传达给读者。在京都，正是这样的研究才成为“有意义的”研究。

### 三 发端于人类学和医学 —— 在东京大学的研究

#### （一）生态人类学的探索

说到东京大学生态人类学的发端，可以列举的有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的杉浦健一于战前开始对阿伊努人和在中国台湾地区及密克罗尼西亚等地的野外调查。杉浦的研究，重点是放在经济和社会的层面，认真地记录和分析人们的生活是其研究的转折点（杉浦 1948）。当时在东京大学，自然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不分，都在理学部之中，所以杉浦的研究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文化人类学独立形成了以石田英一郎、泉靖一等为中心的新的研究分野。

在文化人类学分离以前，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形

态学和先史学，但也有一些具有生态学观点的研究。例如小林和正以小集团为对象的人口研究，虽然是间接的，但也影响了后来的生态人类学者(小林 1963)。

在尚未培养出直接继承杉浦和小林的研究的后续者的情况下，明确打出生态人类学研究旗号的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后的事。而其中心人物是渡边仁，他一方面在欧洲和中东进行史前史的发掘调查，一方面又谋求复现阿伊努采集狩猎时代的生态状况。渡边在理学部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在他 1964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从物质、社会以及认知的层面对阿伊努的生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Watanabe 1972) 其主要内容被收入了在当时人类学界有影响的 *Man the Hunter* 之中。渡边的生态学研究受到英国的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他把人类(或他们的社会)和环境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区分，这一点对年轻学者影响很大。他的分析方法是系统的，具体体现于其先史学的严谨的分类方法中。此外，渡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东京大学理学部开设了生态人类学讲座。

渡边对阿伊努的研究，由于具有复元采集狩猎时代的性质而不得不采用访谈方式。相对于此，前面提到过的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灵长类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也影响到东京。在东京，在有志于生态人类学的年轻研究者之间，通过田野调查直接观察人类适应性的风气也开始盛行起来。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各地的渔民和马塔迪(日本东北地区从事狩猎的住民)等。这一系列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观察渔捞和狩猎这种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上。渡边认为人类生态可以通过人类活动系统地对这一基轴进行把握，所以，他非常鼓励用理论的观点进行研究。其结果是进行彻底的观察这一观点受到重视，以人类活动系统为媒介对适应和进化的研究一度盛行。然而，从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特征出发，仅仅强调对于人类活动系统的把握，而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生物学意义的研究却比较薄弱，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 (二) 医学中的人类生态学

在这样的形势下，东京大学的研究团体也出现了欲往海外进行调查的动向。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他们开始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预备调查，而刚好此时在东京大学医学部新设了保健学科，其中也设置了生态人类学研究室。此后，在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与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那些强调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团体之间，开始了包括人员交流在内的密切接

触，在此基础上构筑了面向新的学问领域的基础。

在医学部建立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室是把医学或保健学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即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作为具体的、新的目标来开展野外调查的。为此，在生态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方法论也就受到了重视（胜沼、铃木 1970）。在重视参与观察这一点上，虽然看不到和京都大学有什么不同之处，但从东京大学此前的研究背景来看却有较浓厚的生物学的色彩，即在重视营养和人口的同时，在环境、饮食生活、日常行为、价值体系等生物学的相关关系中致力于对健康和疾病的探索。为创立这样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基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铃木继美（现供职于国立环境研究所）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无论是理学部的人类学研究室还是医学部的人类学研究室，都在为追求新的研究而进行探索。在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也有毕业于京都大学的人员在工作。这三个研究团体相互激励，有时也共同出版研究成果。（大家、田中、西田 1974）。在这样的状况下，丰富了研究的观点，扩大了研究的领域。值得赞赏的是产生了一批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取得的成果。例如，以人类生态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为中心的研究小组把移居南美的日本人作为对象进行调查（现在仍然继续着对印第安人的研究）。另外，在人类学研究室则直接结合渡边对阿伊努的研究，实施了对北美和马来半岛的采集狩猎民的调查。像这样，不断地扩大研究视野，尤其是在热带的研究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以行为适应、生计适应乃至营养适应为目的的研究倾向。

如果要强调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两个研究团体之间的差异的话，这也许没有多大的意义。实际上，两方面研究人员的互换是很频繁的。但两者之间具有不同学风也确是事实。第一，如前述那样，东京大学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重视生物学的倾向。例如，在对环境的理解方面要考虑生物系统的物质循环，把婚姻和食物的分配等社会的行为与人口再生产和营养摄取相联系，把人们的适应作为生物学的群体来把握，这几方面都是其特点。第二，东京大学的研究与京都大学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太重视人类进化的研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灵长类学的直接影响，没有把非洲这一人类学进化的舞台作为调查对象。再者，我们区分两者的差异是有意义的，如果像现实那样，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那就非常理想。

最后再简单地谈一下东京大学最近关心的课题。大洋洲和东南亚的农耕民、渔捞民（包括半农半渔民）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现代化现象

不仅对他们的社会是重要的，对于研究一方也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不少研究者主张应该把现代化现象摆在研究的重要位置上。具体而言，研究者们或对同一对象进行长期的反复调查，或有意识地为复原过去的适应机制而进行努力。其结果也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调查者所能看到的“现实”在他们的历史中具有怎样的位置。另外，研究者们弄清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极微小的环境差异也会带来人们适应能力的极大不同。他们开始积极地涉及迄今为止在生态学研究尚未被触及的问题。怎样把这样的取向与自然史的思考综合在一起，这并非是有意识忽视“非生态学者就难以体会的观点”，而是要抱着那种永无止境的兴趣，通过曲折迂回，去进行田野调查。

#### 四 结束语

前面介绍了以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两大团体的研究历程和成果。日本生态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在 20 年内有了相当的积累，方法和对象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且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独特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前文所提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资源利用方法、采用适宜技术的开发、农村—城市的协调对策等。可以说，源于新观点的“独特”的研究也得到认可和关注。

可以说，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我们深入各种各样的社会中进行观察和思考，可以在社会的要求、实践活动的方针、统一的见解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学习生态人类学不仅对有志于人类学的人，而且对关心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的人也具有极好的启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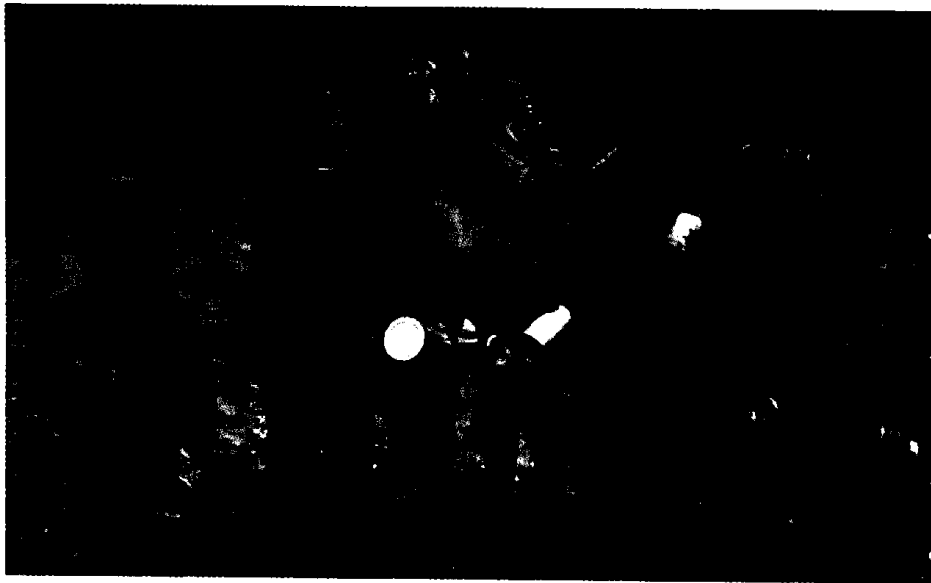
本书以上述学术流派和现状为背景进行阐述。全书分为两部，如目录反映的那样，第一部，对生态人类学来说是主要的课题和应涉及的问题，各位著者生动地介绍了自己所熟知的领域。第二部是专题研究，一看便能知道这些内容都与现代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密切相关。比较以往的生态人类学，这本书给人以面目一新的印象。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能再容纳更多的内容，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却堆积如山。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如果能够了解日本生态人类学的历程和现状，对人类今后在地球上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和谐相处以及对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能够了解一端，那么作者就感到幸运了。而且，我们祈望读者投入这一领域的开拓工作，敲开生态人类学的大门。



## 第 I 部

#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正在练习舞蹈的孩子们（新几内亚高地周边地区）



# 第 1 章

## 活动和生业适应——采集 狩猎、农耕、畜牧

〔日〕丹野正

### 一 人类的进化和生态

现在，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从太空拍摄到的整个地球的清晰照片。那是一个被薄薄的大气层和云层覆盖的美丽行星，在大气和云层之下，生息着无数种动植物和其他生物。像我们这样有理智的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生物的一种。

大约四百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了最早直立行走的人类——类人猿。此后至 150 万年前直立人的形成，人类进化的舞台一直在非洲大陆。然而，在非洲进化的原人，到了约一百多万年前，其分布已经扩大到亚洲和欧洲地带了。

广布于旧大陆各地的原人完成从旧人到尼安德特人的进化，大约是在距今二十万年前的事（片山，1987）。进而大约在距今四万年前，已经进化成和我们一样的新人。在于此大致相同的时期，出现了冰河期的海退造陆运动，通过选它列岛，人类到达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在距今约三万年前，东北亚的蒙古人种的一部分经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后来又扩散到南美洲。人类迁移到太平洋群岛，那是往后的事，不过到了距今 2 万 ~ 3 万年前，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有人类分布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人类都是单一的智人，是亚种。

地球上有大象、鲸鱼等比人类大得多的动物，但人类却是所有动物中的最优秀的大型动物。在灵长类中，比人类大的只有黑猩猩。作为大型动物的人，分布遍及全球。从热带到寒带，从森林地带到热带草原，直至干旱的沙漠地区，环境变化幅度十分显著。在所有自然环境当中，人类都曾经以采集狩猎（渔捞）这样的方式适应生存需要。人类中的一部分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那大约是一万年前的事。再往后农耕民和畜牧民才成为多数。在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阶段之后，在长达数百万年进化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期内，人类是依靠采集、狩猎野生动植物为生的。从人类的历史来看，靠植物栽培获取食物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最近的事。

然而，其后世界的人口却在短期内加速膨胀起来。一万年前的仅为一千万的人口至五百年前已达到了三亿五千万（Lee & DeVore, 1968），现在则超过了五十亿。农业革命之后，如此的人口激增意味着作为一种杂食大型动物的人类，其生物体量在短期内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如果我们把地球当做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来看的话，那么其过程可以说是其间的大大小小的各类动物的生物体量急剧地变成了人类的生物体量。以各地域丰富多彩的植物和以这些植物的生物体量为基础，作为大小各类动物食物链之总体的大自然，很快就变成了只有人类才能利用的食物和生活资源之动植物种类以及依存于它们的人类这样的单纯的人为的自然。

和农业社会相比，采集狩猎社会时代漫长而近乎停滞。而其间还出现过若干次冰川时期，反复发生过激烈的环境变化。我们的祖先在这样的环境变化或遭遇变化的新的环境中，与其说是依赖作为个体的身体形质和生理能力的变化去进行适应，倒不如说是依赖发明各种生产工具和相互交流等进行文化的适应。从关于猿人到新人以及新人以后加速发展的石器制作技术的史前史考古学的研究中得知，作为采集狩猎生活者的人类确实曾使文化获得过发展。

## 二 采集狩猎民的生计活动

### （一）现存的采集狩猎民

直到一万年以前，地球上的人类还全都是采集狩猎民，然而，现在世界上尚依赖采集狩猎为生的民族集团只剩下大约三十个左右。他们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而且并非处于与世隔绝的地带。他们自古以来与其周

边的农耕、畜牧社会接触，近来其社会又受到文明社会的影响而发生着变化。近几十年来，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已经不能再继续其传统生活方式，有的只好居住在政府设立的保护区中，其中有的要依靠食物及其他物品的援助来生存。

今天，在非洲的热带雨林中尚分布着穆布迪、阿卡、图瓦等俾格米系的采集狩猎民。而在非洲南部叫做卡拉哈里沙漠的热带干草原中，存在着桑人（布须曼）的几个地域群体。作为东南亚的采集狩猎民，有安达曼群岛岛民、马来半岛的塞曼、菲律宾的阿尔塔、印度的比尔霍尔等。澳洲大陆在被欧洲人占领前全都是采集狩猎民即原住民（aborigine）的世界。在西伯利亚北部的通古斯（Tungus）及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北部直至格陵兰岛生存的爱斯基摩人也是有名的采集狩猎民。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与阿伊努人及日本绳文时代的人一样，主要靠捕捞大马哈鱼为生。此外，在北美的中西部大平原（Great plains）和北美大草原（Prairie）等地也存在着印第安的采集狩猎民。

接下来就以笔者在非洲对穆布迪和阿卡的调查为例来概括地介绍采集狩猎民的生活。

## （二）非洲森林的住民

在非洲的赤道地带有树高达 40 多米、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其间有大大小小河流蜿蜒流淌。在森林地带的东北端，一个叫做伊图利的地方住着穆布迪人，在刚果盆地中央的乌班尼河和桑嘎河流域则居住着阿卡人。在热带雨林中分布着属于班图人系等的刀耕火种农耕民聚落。穆布迪人和阿卡人都是从远古开始就一直与农耕民接触。尽管如此，和农耕民不同，穆布迪人和阿卡人都自认为是森林之人，至今仍在森林中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见图 1-1）

以野生动植物为食物而生存的采集狩猎民不可能以大群体聚集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而只能分为数个几十人这样的小群体相距遥远地分散居住。聚落之间往往相距数千米，而且常常是几周后便迁移一次驻地。如果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聚落周围的食物资源就会减少，他们就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采集狩猎。这样当然不如迁移驻地的好。他们仅有的生活用具一次就能背运走，对于他们来说，不停地辗转迁移的游动生活就成了家常便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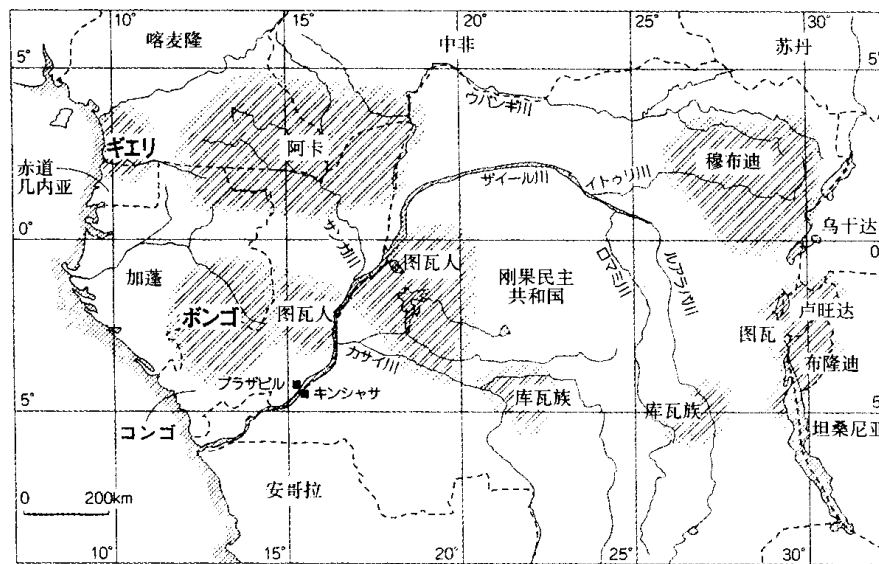


图 1-1 非洲中部地区俾格米人各部落的分布情况

穆布迪人和阿卡人营造居所，先在森林中砍伐出直径为 20~30 米的圆形场地，然后在森林场地建造小屋。小屋的直径为 2~3 米，高 1.5 米左右，呈半圆形，分家族建造。每个居住地从 5 户到 10 户乃至 20 户不等。建造小屋时，妇女负责砍伐用作屋顶骨架的细木，并采集葛郁金科的大叶子覆盖屋顶。男性则砍伐较粗大的木材用来做床。一座小屋夫妻俩半天即可建成。

他们的物质文化也和其他采集狩猎民一样，在质量方面都非常简朴。小屋和床、弓箭和矛等狩猎工具、炊具以及身体装饰物等，全部不过七八十件。而且这些物品约有三分之二是用植物材料制成的。很多工具是根据需要当场制作，用完即弃之。工具的制作不仅大部分就地取材，就连小刀、山刀、斧头、矛尖这些物品，除了刃部之外也都使用植物材料。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与森林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森林既是生活用具的材料库，也是食物的储藏库。（见图 1-2、图 1-3）

住在帐篷小屋的人天明即起。妇女和少女起来后使用灌木枝做成的扫帚打扫各自小屋前的场地。垃圾则丢到屋后。然后妇女们开始去汲水，并取来干树枝点燃屋前的火塘。俾格米人采取保存火种的办法，随时小心不让火种熄灭。无论是迁移还是外出狩猎都要安排几个人保护火种。采集狩猎民一天通常吃两顿饭，早餐多为前一天所剩饭菜，比较简单。



图 1-2 在小屋前削木棍制镖枪的阿卡男子



图 1-3 在营地中场地上玩耍的阿卡孩子们

女人们忙碌的时候，男人们则交替接过同伴手中的烟来吸。他们一边交谈一边修理狩猎工具或制作新的弓箭、矛、套扣、像网球场的拦网那样的猎网以及编网用的绳索。也有人早上便去森林中寻找制作工具的材料。早上就做一阵子这些活。吃了早饭后如有必要便去采集和狩猎。一般来说，他们不为获取食物每天劳神，只要有够一天的食物他们就不为明天担心，而是安享今天。